

评安井三吉新著《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徐 勇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著名的日中关系史专家安井三吉新著《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1930年代在华北的日中对抗》，于2003年由东京研文出版社出版。安井的卢沟桥事件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积累既久，著述甚多，代表性强。新书则进一步详尽考察战时日军作战日志、官方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研究分析了军政当局的政策与战略，并在全面梳理中日两国既有成果基础上，充实自己的论述。本书在资料、论证诸方面所达到的新水准，使本书成为了卢沟桥事件研究中又一部代表性著作；尤以其应对中日两方专家不同意见，所表现的鲜明的论辩特色，给人以深刻印象。当然，著者的卢沟桥事件“偶发”论诸多观点、及其“第一枪”的繁琐考据，值得重新商榷。笔者曾就若干问题直接请教过安井先生，现拟作如下评述，以飨读者。

一 深刻揭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展轨迹

安井新著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从柳条湖事件到华北分离工作”，约占全书正文的2/3篇幅。其时间跨度自1931年到1935年，正好可以同1993年出版的、以1935年华北事变为开篇第一章的《卢沟桥事件》相互衔接，两部著作构成了姊妹篇。

安井在多部论著之后，再以大量篇幅论述其间发生的一系列

冲突事件,综合划分为“柳条湖事件和华北问题”、“热河作战和华北问题”“日益加剧的华北矛盾”等三个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深刻揭示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展轨迹。着力分析事件之前的背景因素,这是新著的重要特色。安井在序言中强调:“本书的目标,是追求分析从柳条湖事件到华北分离工作的连续性。并且不止于中央的范围,还要对于华北现地的当事者们作相应的考察”。^①安井指出,“日中战争从局部地域阶段向全面阶段转进时期的、华北现场状况的检讨是不可缺少的”。^②

安井强调其中的要点是:“本书前本部分值得特别留意的有如下几点:首先,是检讨日本从1931年9月开始,不止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不限于东北还要控制华北的计划,还为其实现而不断实施军事压力及政治工作。至于控制华北的计划,并非始于1935年‘华北分离工作’,也不是开始于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而是在1931年柳条湖事件之同时即已着手。”^③由此指出了日军侵吞华北政策的计划性与连贯性,及其作为国家侵略行为的基本特征。这在实质上已经排除了日军各种行动的“偶然”论,也不同于将责任推于现地部队的“独走”论,表明了著者所持客观的学术立场。

安井明确指出,在卢沟桥事件前的“局部地域战争阶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方针”有两大特征:一是“分治合作方式”,即建立“满洲国”那样的“华北国”、“蒙古国”等傀儡政权;二是“现地解决方式”,即将属于国家之间交涉的问题交于派驻现地的日军同中国方面地方当局进行交涉以解决之。^④著者指出,日军侵略计划的炮

① [日]安井三吉:《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1930年代在华北的日中对抗》, (东京)研文出版2003年,序第20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序第21页。

③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序第20页。

④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序第21页。

制与具体实行机关主要有：“其主要的计划者、实行者是关东军、中国驻屯军及天津特务机关等。”^①

安井详细分析了日军侵略行动的展开情况，具体剖析了日军战略家石原莞尔的一系列战略构想：“关东军在筹划柳条湖事件过程之中，不止建立了对于东北、也建立了试图控制华北的计划。”如 1929 年实施所谓“北满参谋旅行”之后，石原炮制《回转身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等方案，提出“统治中国之根本要领”，计划将中国划分为 7 个大区，分设 7 个总督加以统治。^② 著者十分精辟地指出：“在石原等人一边，柳条湖事件，乃是作为日中战争以至日美战争之一环被构想出来。而且，他决不想回避和中国的战争，反而强调日中开战的形势不断酝酿升温，各种手段都是必要的，追求诱发日中战争的手段。”^③

安井进而揭露，日军历来惯用挑衅手段以扩大事端：“关东军认为，‘不可以等待好机会的‘偶发’，要自己创造机会’，结果不是依靠‘偶发’的‘好机会’，而是认为应该诉诸‘谋略’创造‘机会’。”^④ 并毫不含糊地明确指出：“从柳条湖事件、天津事件、上海事变以及山海关事件，这一连串事件，全都是由关东军或中国驻屯军的‘谋略’炮制的。”^⑤

安井深刻揭露日本军政当局抹煞真相的阴谋手法。其中 1931 年 11 月 27 日的第二次天津事件，竟同卢沟桥事件有惊人相似的“枪击”问题：“中国驻屯军以有流弹飞进日本租界为口实，开始对中国各官厅炮击，民家亦受到炮击的严重破坏，各处都有死伤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序第 20 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30-32 页。

③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33 页。

④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34 页。

⑤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82 页。

者。”^①

安井从多个侧面揭露日本最高当局抹煞事实真相,操纵舆论的史实:“在军队的关系文书之中,从现地送往中央呈报这样事件的报告文书,都没有留下,不过陆军中央当然是熟知这样的事实。”进而指出最高当局歪曲事实,利用媒体煽动仇华情绪,为其扩张战争服务:“然而,陆军中央不仅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还作了180度的歪曲,将所有问题当作中国方面的作为,在日本民众心中深深烙进了‘暴戾的支那兵’的印记。报纸等媒体也处于军事的报道管制之下,不但不能传达真实,反而持续不断地向国民灌输错误报道,炮制并强化了‘暴戾的支那兵’这样的印象。”^②

安井对于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前的历史的叙述,无疑是对日本大陆侵略政策作出了全面、深入的揭露。或许是因为这样鞭辟入里的介绍,冈野笃夫等右翼专家被迫需要站在全景视角来同安井论战,并抱着强烈的排斥心理从超越学术角度攻击安井。

二 卢沟桥事件的史料发掘与原因分析

安井新著第二部分标题为“关于卢沟桥事件”。包涵了对于“七七”之夜事件发生具体过程的详细回顾、直接原因分析以及不同观点辩驳等基本内容,篇幅虽然只占正文的三分之一,却列示了不少新材料,总结了积累多年的学术思想,完整表述了著者的基本结论,为全书论述重心之所在。尤集中了与诸多不同观点的辩驳,具有鲜明的论战特色。

安井对于卢沟桥事件的历史地位极为重视,指出如按日中战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52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62页。

争为“十五年战争”说考察,则卢沟桥事件为从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如果依照“八年抗战”说,则为“日中战争的开端”。^① 新书将考察卢沟桥事件的所有“范围和问题群”归纳为“卢沟桥事件的历史地位”、“卢沟桥事件的性质”、“是偶发事件还是计划(谋略)事件”、“若干个别问题”等四大要点进行分析。表述的核心问题是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原因,即著者所说“狭义的”七七之夜事件的发生原因。

所谓“狭义的”范围是指“七月七日夜,以向演习中的日本军‘开枪’事件(对此事件的有无存在争议)和‘兵一名去向不明’(不成立)这样的事件为‘发端’,到翌八日午前五时三十分由日本军向中国军发动战斗”;与此相对,广义的范围是指“以七月七日夜的事件为‘发端’,经由七月二十五日的廊坊事件、翌二十六日的广安门事件、到二十八日的日本军向平津地域全面攻击”。著者强调,“本书检讨的对象,主要是狭义的卢沟桥事件。”因为著者所要讨论的“偶发”还是“计划”的对立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范围^②,这样也就划定了新著的论述范围。

那么七七之夜究竟有多少问题值得研究考察呢,安井梳理了中日两国既有著作的观点、以及各方在论战中讨论过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如“究竟有无七月七日夜的‘第一枪’,开枪者是谁,志村菊次郎二等兵‘去向不明’的原因,是谁向将志村归队向丰台大队本部传送报告的,牟田口廉也第一联队长和一木清直第三大队长命令驻屯队出动的主要理由究竟是‘发炮’还是‘兵一名去向不明’,在‘兵一名去向不明’问题消解之后,牟田口和一木仍然不撤收部队的理由是什么,8日午前3时25分的所谓‘发炮’以谁为目标,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179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179页。

牟田口4时20分向一木下达‘战斗开始’命令的根据是什么,还有所谓‘第一发’究竟是应该考虑为七月七日夜的‘发炮’、抑或8日早晨5时30分的‘战斗开始’,进而还有应该怎样看待第二次丰台事件(1936年9月)等等^①,列举考证课题达10余个之多。

安井进而将论述集中到事件发生两种判断的辨析之上:“关于卢沟桥事件,在日本的研究者中间存在论战,还发掘出了若干新的史料。在中国,卢沟桥事件=‘日本军计划(谋略)’说却一以贯之占据主流,将其视作日本侵略中国史上的‘计划’性事件的看法始终屹立不动。按这种观点,许多日本的研究者提出的为什么会从‘偶发’的小事件扩大为那样的大战争,这种设问方式都会被视作日本的侵略辩护。”^②

安井将“偶发”说与“计划(谋略)”说的对立作为全书辩驳的矛盾焦点,又对概念作了界定。他以柳条湖事件的预先炮制为例,说明在事件之前既有石原莞尔等人制订计划,继是河本末守等实施铁路爆破,然后是关东军对于东北地区的攻占。因此,著者所定义的“计划”模式,即柳条湖事件的模式。

著者借助这一模式指出:“卢沟桥事件同柳条湖事件不同,‘第一发’的开枪者是谁没有判明。所以围绕着卢沟桥事件的经过,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各种各样的论文和著作都发表出来了。其论点之一,是事件为‘计划’的还是‘偶发’的这样的问题。本书认为,日本的一种说法‘中国共产党计划’说和中国学者们的所谓‘日本军计划’说都是错误的,卢沟桥事件对于日中双方来说,都是‘偶发’的。”^③安井的“偶发”结论,是从“第一发”的追查中提出来的。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180-181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178页。

③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序第21-22页。

安井继又追溯了“偶发”说的源流,指出七月七日夜事件爆发之际牟田口等人的说法即为最早的“偶发”说。^①安井又声明,将事件的发生判断为“偶发”,不影响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他在多部论著中明确过的、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总结论:“(1) 日中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2) 日军在卢沟桥事件前,就制定了《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1936 年)等以武力占领华北的计划;(3) 卢沟桥事件的‘开端’是‘偶发’的,‘日本军计划’说不正确;(4) 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全面战争,其责任在日方。”^②

安井确认了日军制订有占领华北要地的计划,并进行了实际演练,却仍然不认为七七之夜是按预定计划行事。他说:“支那驻屯军作出了《北支那占领地统治计划书》,计划以武力占领和统治华北;另从《牟田口手记》看卢沟桥事件事变之时,该军已经制定有当同第二十九军发生‘万一’事态、即攻击第二十九军首脑部和卢沟桥中国军队等两个《奇袭计划》,并已进行过多次的实地勘察、实施过实际训练。所以可以说,支那驻屯军方面是启动了如果发生‘万一’那样的事态、即发动‘奇袭计划’的准备。但是,七月七日夜‘第一发’的本来意图,还不能说是执行了发动‘奇袭计划’的事前‘谋议’。”^③

安井将行动决策的核心因素连接到现地日军指挥官身上:“问题是,当岩谷、内田两人的传令到达丰台之后,牟田口廉联队长和一木大队长对于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可以说这样的结论才是妥当的。”^④强调了现地指挥官的“人为”亦即偶然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184-186 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181 页;〔日〕安井三吉著、史桂芳等译:《卢沟桥事件》,(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226 页。

③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205 页。

④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206 页。

因素的作用。

著者还以推理方式,说明花谷正关于柳条湖事件的文章写于战后的1956年,终于揭露了日军“谋略”事实真相。但在卢沟桥事件问题上,日军将校自战前1938年开始陆续在《朝日新闻》等报刊发表文章或演说,却一直没有出现花谷正那样的揭露现象。如果存在日军“谋略”,就会在战后社会条件下,像揭露柳条湖事件那样被披露出来,因为“柳条湖事件的关系者和卢沟桥事件的关系者,在战后日本的社会立场是完全相同的,支配其发言内容的要素不复存在”。^①

安井强调说,将卢沟桥事件“判定为‘偶发’,决不是要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免责、或减轻其罪责”。^②他确认日本侵华战争为侵略战争:“关于日中战争的性质,可以换用一种说法,即是侵略战争抑或自卫战争的问题。我的认识,是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又指出日本国内对此存在争议,也是著者过去同冈野笃夫的论战的焦点问题之一。^③

关于争议甚大的“第一枪”有无研究必要及其研究方法的问题,涉及到安井的基本论点。新书指出,由于“兵士们(所说)‘从头上高空飞过’的夜间‘第一发’,只能凭藉声音和闪光加以确认。于是,其证明也只能依赖所见、所闻者的证言”。^④著者认为,有关“第一枪”的时间、方位、数量等因素疑点甚多,“关于开枪者,在日本第29军兵士’说占据主导,而我尚不能断定是谁,所以持保留态度”。^⑤其观点同其他右翼日本人所指中国人开枪,即“第29军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203-204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204页。

③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200页。

④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198页。

⑤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198-199页。

兵士”说固然不同,不过仍强调了“第一枪”的存在及其诱发事件的重要作用。

有关“兵一名去向不明”的问题,安井继续同曲家源辩论:“这是曲氏的卢沟桥事件=‘日本军计划’说的核心部分。对于此点的考虑方式将极大影响其他论点的走向。”^① 著者承认在目前,“不能完全否定曲氏的见解”,但强调所依据资料不足,“曲氏之论述现在尚未超出推论的范围。将志村的‘去向不明’作为‘计划’的根据,如果(这一根据)是这样不确实的话,曲氏有关‘日本军计划’说及其他观点的根据也将受到全面质疑”。^②

安井非常强调资料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关于卢沟桥事件,尚有许多不明之点。”如为什么为报告志村二等兵归队之事,清水中队长另派传令兵到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在 8 日午前即半夜 1 时既已到达,也就是说北平的联队本部当在决定 5 时 30 分开战前既已了解失踪士兵归队之事,但事态却仍然继续扩大;此外还有第二十九军和中共关系等问题都需要继续找资料加以解决。^③ 他多次强调:“卢沟桥事件研究困难之处,在于基础性资料之不足。”^④

那么,究竟有无可以说明当晚事件缘由的基本材料呢,安井十分依重当晚的日方直接关系者,即“比如说清水中队长、野地伊七小队长、长沢连治分队长等”人的口述史料。安井曾反复引证过对于当时任第八中队第二小队第二分队分队长的长沢连治的专访,新著更将其访谈录作为文中专节,以其占有整四十页的篇幅来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199 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200 页。

③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234 页。

④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 208 页。

看,著者显然将长沢的回忆作为可以直接依靠的重要资料。

长沢有的一些什么说法呢?其中心仍在于强调第一枪的偶发情形。长沢描述当时确有枪声从头上仆仆地飞过去,也提出了一些新解释,说演习日军的轻机枪误射,可能刺激或引发了中国军队的发射。

“(安井)问:因为这方的轻机关枪射击,中国一方吃惊开枪,是这样的情况吗?长沢:是啊,你方不是在打枪吗,好,我也有打枪的权力,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受了轻机关枪射击的相当刺激啊,轻机关枪,那一打,火花发散哪,声音同时很大,很容易看到。”^①

长沢描述了“第一枪”的偶发情形,有助于确认卢沟桥事件的“偶发”性质,这是安井新著最需要的口述史料:“七月七日夜‘第一发’的本来意图,不能说是执行了发动‘奇袭计划’的事前‘谋议’。”^②

三 安井两线论战及其新著内容再商榷

安井的卢沟桥事件研究,在史料选择、分析方法、归纳结论诸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在中日两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意思的是,在正面的肯定评价之外,在中日两国学界都有专家写出批判文章,同安井进行辩驳,使安井一直处于两线“作战”境地。经10余年时间,论战犹未沉寂,新著可谓由论战催生的作品。

日本方面的一个批判者是评论家冈野笃夫。冈野曾写过《卢沟桥事件50周年有感——世界的洪波与日本》^③等文章,将明治

①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258页。

② [日]安井三吉:前引书,第205页。

③ 冈野笃夫文章见《自由》1987年2月号。

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扩张描述为反抗白人列强的解放战争,又将侵华战争美化为防止苏俄的战争。显然,冈野属于悖离学术研究的科学规则,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的右翼战线。冈野写出《“学者研究”之责任——读安井三吉教授的〈卢沟桥事件〉》等多篇文章,论证日中战争的原因是“第一次欧洲大战后中国的排日活动”引起的,批判安井将战争责任归于日本军国主义等诸多结论。

带有强烈的全面排斥情绪的冈野,并没能够仔细研究安井的各种论点,便将安井对于“七七”之夜事件发生的“偶发”性质的具体论述,当作“计划说”加以攻击。冈野还将历史问题的辩论转移到道义层面进行人身攻击,说学者专家在生活上接受了纳税人的养育,在社会上占据了国家的工作岗位。而作为纳税人的“一般的人不能够以自己之力查清历史,故而只能相信专门的学者之言,而学者是否意识到了其中的责任呢”?^①安井用理性的语言回答了冈野的尖刻攻击,在《自由》发表研究性的反驳文章,双方“进行了三次交锋”。

安井不仅需要应对本国右翼势力的攻击,也需要回答中国学者的一系列批评。在中国方面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曲家源先后多部论著^②,双方辩论的问题,按安井的归纳,主要是曲氏提出的“不存在所谓‘第一枪’,即使有也是日军所为”等 5 个论点。^③有关“七七”之夜事件的具体分析,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曲家源

① 冈野笃夫文章见《自由》1994 年 1 月号。

② 曲家源先论著主要有《论卢沟桥事件的起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和《卢沟桥事件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学者商榷》(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版)以及《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4 期)等。

③ [日]安井三吉著、史桂芳等译《卢沟桥事件》,第 229-230 页。

的论述大体能够代表中国学者的观点。^①

新书对于过去的论战情形、论战对手观点与方法介绍十分详尽,更集中了自己十余年的两线论战论点及其论据,雄辩之力卓然不凡。笔者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赞同安井的见解,却仍不免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的视角,需要和安井再作探讨。商榷之焦点,仍在于安井的“卢沟桥事件对于日中双方来说,都是‘偶发’的”这一关键性结论。^②

从学术史上考察,安井说他同中国学者的分歧是“偶发”与“计划”的分歧,并说在中国“‘日本军计划(谋略)’说却一以贯之占据主流”,这样论断并不准确。使用“计划”概念以确定“七七”之夜日军行动性质,固然是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但是海峡两岸学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关键词,非“计划”亦非“偶发”,而是“挑衅(起)”,此外还有“阴谋”说等概念。其使用情况有:

中国大陆地区的权威著作、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全三卷)的说法是:“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③;台湾学者吴相湘指出:“日军在北平的卢沟桥附近挑起衅来。”^④李云汉指出: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挑衅……结果是两国全面战争的展开”。^⑤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关日军侵华政策与战略的前沿著作中,

① 请参考前述李云汉、曲家源的论著以及荣维木《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件》(广西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胡德坤《七七事变》(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武月星《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张宗平《浴血卢沟桥》(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② [日]安井三吉:《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1930 年代在华北的日中对抗》,序第 21-22 页。

③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9 页。

④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年版,第 360 页。

⑤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7 年版,第 2 页。

徐勇指出:日军“在长时间内不断进行非法演习,故意制造事端……其实质是进行战争挑衅”。^①臧运祜指出: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了事端”。^②等等。

“挑衅(起)”说源流,早于事件当时的 7 月 10 日中国政府外交部致日本使馆抗议书中既已指出:“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③不独中国人认为是日军故意寻衅,当时的美国驻北平武官巴勒托(David D. Barrett)亦在战后审判中作证:“七月周初宛平附近日本军举行的夜间演习,是故意的挑拨。”^④

也就是说,“挑衅(起)”说源远流长,且现今海峡两岸主要的著作大都继续使用“挑衅(起)”概念。“挑衅(起)”说与“计划”说相通,但两者并不等同。“计划”说以“七七”之夜事件为关注范围,注重强调日军行动的预先安排;而“挑衅(起)”说则以“七七”之夜为中心,兼顾此前诸多史实关系,强调综合把握日军的计划预案、目的意识、行动方式以及实际结果诸方面的问题实质。故忽略“挑衅(起)”说的学术史地位是不妥的。

就史实上看,日军在卢沟桥地区行动、包括“七七”之夜的挑衅战术绝非偶发,而是在其大陆政策支配下,继柳条湖事件攻占中国东北地区、进而向华北扩张、展开战略行动的组成部分。日本军政当局将其华北驻军升编为与关东军同等级别的战略集团^⑤,擅自增兵进入中国要地,制订了《北支那占领地统治计划书》,还有《牟田口手记》所记载的业已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演练的两个《奇袭计

① 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7 页。

② 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1 页。

③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 1987 年版,第 330 页。

④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 1987 年版,第 326 页。

⑤ 参见松崎昭一:《支那驻屯军增强问题》上、下,国学院杂志第 96 卷 2、3 号;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第 129—139 页。

划》等等。1936年日军侵占丰台,就是其中关键的一步。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承认:侵占丰台“是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①安井新书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指出:“如按石原莞尔的方案,如果不是丰台而配备于通州,卢沟桥事件就不会发生,或许以别的形式出现。”^②

日军非法侵占丰台等直接侵略行动,使双方已进入准战争状态,而日军得陇望蜀,由丰台侵扰卢沟桥,试图以渐进战术实现其华北分离政策。正如中国守军营长金振中在同日军交涉时指出:丰台距卢沟桥7公里,而丰台日军竟擅自进入中国军队“既设阵地”实施军事演习。这是日军进一步的对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的公然挑衅。这样的演习长达半年,中国军队忍辱持重坚持口头交涉,日军则毫无顾忌恣意胡为,这不是挑动战争又能是什么!

从方法论考查,新书表现了十分深厚的实证功夫。但强调“狭义的”的研究视角而孜孜于“第一枪”考据,忽略日军非法占领丰台及其非法演习等战略布局,这样“实证”的结果,终于陷入了难得正解的繁琐考证。新著无专章介绍1936年的诸问题,这大概是考虑同1993年著《卢沟桥事件》相衔接,而再看《卢沟桥事件》,其中对中国驻屯军的升编、增兵及其侵占丰台的内容仅有16页(中文版),相比较其他问题,如介绍冀东伪政权即有15页(中文版);新著有专节介绍1932年初天津事件(日文版占15页),全文录入的长沢连治专访更长达40页(日文版)。故有关1936年诸问题,是安井研究中篇幅较小的薄弱部分。这样的不足,使著者拘泥于七七之夜的日军战术行动、而忽略了该事件同1936年华北驻军升编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76页。

② [日]安井三吉著、史桂芳等译:《卢沟桥事件》,第75页。

等战略全局的直接关系。

笔者认为,对于七七之夜的日军战术行动考证,应结合日本战略传统进行分析。日军战略具有集团性、渐进性的特点,战术行动既是其战略指导的展开,也能够汇聚或调整其计划方向。笔者曾在比较中指出:“在德国,由于希特勒自始至终控制一切权力,统帅意志相对集中,战略构想比较统一。而在日本,军制独特,统帅更迭频繁,故而其战略指导,总的来说是散漫无章的。”^①所以,在东方战场上纵然找不到“巴巴罗莎”那样的一步到位的作战计划,也不能确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偶发”的。

有关方法论问题的再一个要点,在于“计划”的模式问题。柳条湖事件的“模式”并非唯一标准。日军挑动各种侵华侵略事件,具体手法当然不会相同。日本非法增兵华北及其侵占丰台,同柳条湖事件一样是其大陆侵略政策的产物,也是其侵占中国东北战争行动的继续,并受其《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等构想的实际支配。因此,丰台日军七七之夜的战术行动,是华北日军升编之后战略展开的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的“计划”说同“挑衅(起)”、“阴谋”说等一样,虽然切入点有差别,本质上也是可以成立的。

还有必要指出,判断丰台日军部队七七之夜的战术行动,也同分析日军的战略行动一样,不能以文本文件的存在与否作依据。因为日军战败时大量销毁文件,这也是安井指出的:“在军队的关系文书之中,从现地送往中央呈报这样事件的报告文书,都没有留下。”^②

① 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绪言,第2页。

② [日]安井三吉:《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1930年代在华北的日中对抗》,第62页。

四 简要结语

安井最近又在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总之必须要指出的是，卢沟桥事件是在日本方面主导之下扩大开来的。”^①安井不畏右翼势力的刻意攻击，能够不倦发掘可靠的史料以作科学研究，努力坚持公正的评述，的确是一位保持了良知和责任感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学术研究很难不受到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因素干扰。自1931年攻占东北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持续进行了15个年头，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东半球。卢沟桥事件则是日本的侵略战争走向全面升级的关键点，各方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日本右翼则为开脱罪责而抛出所谓“第一枪”考据问题，这是20世纪有关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典型的狡辨性命题。

安井写出了大量论著揭露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其新书也成了卢沟桥事件研究中又一部代表性著作。可惜的是在关键性的卢沟桥事件原因之上，新书陷在所谓“实证研究”的迷团、困于不能成立的所谓“第一枪”战术动作的繁琐考据，最后得出了“偶发”的不实结论。笔者读罢安井新书，为此深感惋惜。

(作者徐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日]安井三吉：《卢沟桥事件为何扩大为全面战争的？》，《诸君》2003年7月号。